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丁世鑫

(浙江理工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研究,综合历史学和现代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和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从传播到接受的途径和路线,再现其在当时被传播与被阐释的“热捧”状态以及“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被时人接受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比较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文学;中国

**中图分类号:**I51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2-0082-05

在俄罗斯19世纪文学诸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被引介到中国的时间可以说是最晚的一个。五四以前,陀氏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甚至连名字也不为中国人所知道。五四之后,中国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引介俄国文学的浪潮,陀氏随即作为俄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为时人了解与接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甚至一度受到“热捧”。

## 一、陀氏作品的翻译和出版

在众多变黄发脆的报刊杂志里,我们可以翻阅到陀氏在中国最早的译文。1920年5月26~29日,上海《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连载了乔辛瑛翻译的短篇小说《贼》,这是目前发现的陀氏作品的第一篇中译本。译文前的《译者志》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遂表同情于痛苦无告之人。所著小说都描写这类人的情形,如破屋记(Memoirs of a Dead House)、虐待和压制(Downtrodden and Oppressed)等,是最出名的。一八六六年,又著犯罪与受罚

(Crime and Punishment)……其怜悯苦痛之心,与其感化力之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乔辛瑛《译者志》)译者把介绍的重点放在《死屋手记》(破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虐待和压制)和《罪与罚》(犯罪与受罚)上,预示了之后陀氏作品翻译的方向。随后,《东方杂志》第17期第11号上刊登了铁樵所译的《冷眼》(即《圣诞树与婚礼》),陀氏此文在1921年2月11~12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连载,名为《圣诞树与结婚》,译者为良浚。此篇后来又由叶劲风翻译,选入上海公民书局1921年10月出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中;同年12月,仲持也译成此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23号上,名为《圣诞树前的贫孩子》,被选入192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的《近代俄国小说集(一)》中。从其译文的数量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很受译介者的青睐。

此后,陀氏作品的中文译本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学生杂志》第11卷第6期连载了泽民译的《乞孩》(即《圣诞树前的贫孩子》),第11卷第9号、第12卷第3号和第7号上分别刊登了售灵翻译的

收稿日期:2010-10-21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0CGZW07YBQ)

作者简介:丁世鑫(1975-),男,山东济南人,讲师,文学博士。

《孤女聂丽的故事》(节选自《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在阔人的寄宿学校里》(此篇选自《少年》)和《乡人玛奎》(即《农民马列伊》),第12卷第1号和第2号上刊登了S. N译的《发弗娜的日记》。1921年6月1~13日,《晨报》相继连载了文农翻译的《贼》。1922年,《民钟》上发表了太一翻译的《罪与罚》的节选。《小说月报》第12卷《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也借势刊登了陈大悲翻译的《贼》,后来此篇小说选入到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名为《熊猎》的俄国短篇小说集中,这篇译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2年又作为陀氏的代表作入选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世界文学读本》和上海经纬书局1935年出版的《俄国短篇小说精选》中。1925年《莽原》第2期上刊登了韦丛芜翻译的《阿列伊》……这种争相译介的阵势,与五四之前那种门庭冷落的情景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仅仅是开场锣鼓。

1926年6月,北京未名社出版了韦丛芜翻译的《穷人》,这是国内陀氏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可称得上是中国陀氏作品翻译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件。鲁迅对此评价道:“这回……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介绍到中国来,我觉得很弥补了些遗憾。”<sup>[1]</sup>此书以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为主要参照,并参考Modern Library的英译本,后来又由鲁迅用日译本和韦素园根据原文加以校订而成,可谓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它收入在《未名丛刊.5》中,卷头有英译本引言及鲁迅所作的小引。此译本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短短4年就再版了3次,到1947年为止,就已达12版之多。1929年4月,未名社又结集出版了李霁野翻译的短篇小说集《不幸的一群》,其中选有陀氏短篇小说《贼》。可见,当时未名社对陀氏作品的翻译工作是极为投入的。

在未名社的引领下,很多刊物和书局纷纷地推出了自己的译作。1927年,《小说月报》第18卷第4号上刊登了杨彦劬译的《农夫马尔来》。1927年4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白莱译的《主妇》,后来此篇又与他译的陀氏另一篇小说《家人》一起入选1927年鲁彦主编的《给海兰的童话》一书中;1927年5月1日,香港受匡出版部出版了袁振英译的短篇小说集《牧师与魔鬼》,值得注意的是《牧师与魔鬼》摘译自陀氏最受争议的小说《群魔》。1928年,《真善美》第2卷第5号上刊登了古鲁译的《一个诚实的贼》,后来他的另一篇译作《九封信里的小说》又发表在该刊1928年第2卷第6号上;1928年1月,陈道希译的《陀斯妥夫斯基致兄米海尔书》在

《语丝》第4卷第9期上发表;同年4月,该刊第4卷第17期和第18期上又发表了李伟森翻译的《朵思退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关于他们间的争端之信件),其中不仅包括了陀氏的两封信件,而且介绍了陀氏与屠格涅夫的争端及屠格涅夫的回信,从此陀氏的书信也进入国人的视野。1929年,《泰东》第2卷第5期、第6期上发表了何公超译的《房东太太》。1929年5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集》中收入了孙仲岳翻译的《一个诚实的贼》,后来此译作又选入1937年6月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旧俄小说名著》中。

1929年6月,国内第一本陀氏短篇小说集《一个诚实的贼及其他》由上海现代书局结集出版,译者为王古鲁。此书据英译本转译,包括陀氏短篇小说6篇:《一个诚实的贼》、《农夫马莱》、《天堂的圣诞树》、《九封信里的小说》、《鳄鱼》和《一个惹人笑的梦》,后2篇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陀氏的传记此时也引起了译介者的很大兴趣。1927年《小说月报》第18卷第4号上刊登了宏徒译的《死刑台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一文,后来此篇又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文坛逸话》一书中。1929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李伟森翻译的《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记及回想录》一书,此书包括上下两卷,值得注意的是下卷,其中包括“托尔斯泰与司特可夫对于朵思退夫斯基之批评:司特拉可夫小传、托氏致司氏信(3封)、司氏致托氏信(5封)、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答复——我给司特拉可夫的答复”等。我们知道,1883年11月28日斯特拉霍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曾经对陀氏的人品做了肆无忌惮的攻击,首次提到陀氏曾经强奸过一个小女孩;1913年10月,这封信被公开发表,遭到陀氏夫人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严厉驳斥,因而也成为陀氏研究领域的一桩公案,李伟森译作中的这部分内容向国人提供了此事件的第一手资料。1929年底,韦丛芜也完成了此书的节选本翻译,名为《回忆陀思妥夫斯基》,并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同一本书不到半年时间被翻译过2次,在当时也算是一件趣事。

##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评价及研究

1920年元旦,茅盾在《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中,号召“用一

年的时间,大家一齐努力”<sup>[2]</sup>,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学翻译进来,而他“要急就,便不得不拣几人几种的著作尽先译出来”<sup>[2]</sup>的作品名单中,就有陀氏的《少年》、《地下室手记》、《白痴》和《罪与罚》,可见当时学人引介陀氏作品心情的急切程度。

1920 年 4 月 11 ~ 14 日,《晨报》连载了孙福熙的文章《托尔斯泰同时的文学家》。文中,作者难抑对陀氏的崇敬之情,称其为“最伟大的俄国人”<sup>[3]</sup>,甚至认为托尔斯泰也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孙福熙说:“他年纪越老,受陀氏的影响也越加明显,他对于受苦者的同情,和对于赎罪的兴趣,逐渐增加,直到他未了的一部大小说《复活》,我们看出他写得完全是陀氏的精神”<sup>[3]</sup>。其中显示出非常明显的“抑托扬陀”的倾向,这在以后的评述中是很罕见的。

与此同时,王统照也给予了陀氏极高的评价,称其为“高瞻远瞩的文学家”<sup>[4]</sup>,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一样“都是俄罗斯文学改进时代的大人物”<sup>[4]</sup>。作者不仅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指出其作品中的革命性因素,而且将其一生都看作一场社会斗争,甚至陀氏近似病态的性格,也被认为是“因疾恶现代的生活与罪恶,而成为病理的现象”<sup>[4]</sup>。在这里,陀氏的革命者形象被展现出来,它具有时人赋予俄国文学家的时代特征,即郭沫若说的“俄罗斯最近的大革命,我们都晓得是一些赤诚的文学家在前面作了先驱的呢”<sup>[5]</sup>。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陀氏全盘称赞,比如颇重道德性的学衡派人士胡先骕对陀氏就颇有微辞。他虽承认除托尔斯泰以外,“惟陀思妥夫士忌,最为自然主义派之魁首”<sup>[6]</sup>,但认为其作品“不包含一种道德之教训……无由知减少此痛苦之方,似欲令人信此无限之苦痛。为无由以减少之者,故读其书者,但觉愁苦郁闷,而无得艺术之美感也”<sup>[6]</sup>。这种评价真实地反映出国人与陀氏的审美隔膜,但与当时的主导舆论并不合拍。

1921 年正值陀氏百年诞辰,很多报刊都加大了宣传力度,《小说月报》是引领这一潮流的主力军。在该刊《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中,对陀氏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高度赞扬,称其是“人物的心理学家,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调查员,是微细的心的解剖者。他为人类呼吁,他的文学满含着人道主义的性质”<sup>[7]</sup>,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该刊第 12 卷第 11 号和第 13 卷第 8 号又分别介绍了国外学者拉夫令和玛丁·格兰研究陀氏的新作,这意味着境外研究的最新动态此时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东方杂志》是另一家热衷于陀氏研究的刊物,该刊第 18 卷第 23 期中以纪念专栏的形式发表了《俄法两大写实家》和《陀思妥以夫斯基的一生》等文章。前者将陀氏与福楼拜做了比较,指出二人在艺术手法和描写内容上迥异的原因在于“不但是由于国民性的不同,也是由于福罗贝尔的境遇,不像陀思妥以夫斯基那样的栗碌”,对陀氏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国内学术界的第一次尝试。后者则对陀氏的生平与作品进行了非常全面的介绍,称其“能完全代表此旷野民族的伟大精神,能贯彻第三帝国的国民的神秘之心,能喊出从专制魔王、贵族、地主、资本家、警察、宪兵的积威下面所发出痛苦的呻吟”<sup>[8]</sup>,全文处处洋溢着钦慕与崇敬之情,代表了当时国人的普遍感受。

《时事新报》也将陀氏作为重点作家隆重推出,该刊第 19 号中发表了郑振铎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茅盾的《陀思妥以夫斯基带了些什么给俄国》、《陀思妥以夫斯基年谱》及《陀思妥以夫斯基作品一览》等文,并配以作家画像,俨然也是不标名的“陀氏专号”。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郑振铎和茅盾都着眼于陀氏的平民立场及人道主义,认为其伟大之处在于“唤起大家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和“作品中到处叫着‘人啊相爱’的叫声”<sup>[9]</sup>;同期的另外 2 篇文章对推动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也颇有意义,后来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年表》(《小说月报》1923 年第 14 卷第 9 号)、梦乔的《道斯托耶夫斯基年表》(《小说世界》1929 年第 18 卷第 2 期)和韦丛芜的《陀思妥夫斯基年谱》(《回忆陀思妥夫斯基》一书附录)不过是这 2 篇文章的汇总而已。

同年 11 月,周作人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中,将陀氏的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结合在一起,称为“独一的爱的福音”<sup>[10]</sup>,这是将其宗教观念与“为人生”的社会理想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显示了作者独到的洞察力。

这一年,还有几篇值得一提的文章,如愈寄凡的《独思托爱夫斯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陈望道的《陀思妥夫斯基底性格》(《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为这一“盛宴”增添了阵阵锣鼓。

这一热潮到 1922 年仍未消退。《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1 号上专门设立“文学家研究”特辑对陀氏进行评述。其中茅盾《陀思妥以夫斯基的思想》一文对其“性善论”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称其是“人类自古至今的思想史中的一个孤独的然而很明

的火花”,“对于中国现代的青年,犹是一剂良好无比的兴奋剂”<sup>[11]</sup>,可见作者的落脚点仍在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国民启蒙。另外还有2篇名曰《陀思妥以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陀思妥以夫斯基传略》的文章,除了延续之前已有的论调之外,别无意义。相比较而言,更有价值的是该刊中那篇《关于陀思妥以夫斯基的英文书》的资料汇编,它将国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及陀氏作品的英译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总括,后来这些研究资料又出现在《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9号)中,这对当时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3年3月21日~4月21日,《时事新报》连载了署名为C P的文章《朵思退益夫斯基与其作品》。此文在肯定作家人道主义的同时,又不满意于其创作手法,称其作品“好比杂珠沙金石于一炉而冶之的东西一样,驳而不纯,散漫而不贯串”<sup>[12]</sup>,称那种“专写人生与灵魂的悲剧,并且专拣那最黑暗、最悲惨、最恐怖的写在纸上”的作法“未免写得过于齷齪”,虽作者以为这“不过是他的小瑕,不足深论”,但预示出具有“温柔敦厚”欣赏口味的国人开始出现了对于陀氏惨厉、冲突的美学风格的反胃。

同一垢病还出现在1924年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中。在书中,作者毫不掩饰地批评了陀氏作品艺术性的欠缺,称其“粗率而凌乱”<sup>[13]</sup>,小说结构“都很无秩序,事实的连续也不大自然”<sup>[13]</sup>,甚至宣称“他的小说,只能读一遍,第二遍便不能再读下去了”<sup>[13]</sup>,这意味着五四以来那种毫无保留地对陀氏作品顶礼膜拜的激情逐渐趋于理性之后,作家那种独特的、异质的艺术个性便不可避免地开始遭到时人的冷眼和不满。这一时期,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的书籍也将陀氏作为热门作家来介绍,比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的《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西洋小说发达史》、《近代俄国文学家论》和《欧美近代小说史》;泰东书局的《近代文学家》;民智书局的《新文学评论》;中华书局的《世界文学家列传》等书。综而观之,它们多数只是延用了前面已有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新的认识与发现。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文学评论家们以无产阶级理论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将以往的作家都归入到“没落阶级”的行列中加以攻击,造成了很大的声势,陀氏也难以幸免。比如李初梨就著文讥讽《罪与罚》是“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的

好例”<sup>[6]</sup>,郭沫若也警告那些“不革命的作家”不要将“脱尔斯太或者达士多奔夫斯基那样的天才和他们那不革命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护符”<sup>[6]</sup>。这种阶级定性在瞿秋白的《托尔斯泰和朵斯陀也夫斯基》一文中得到了系统的说明,他称:“资产阶级文化战胜贵族阶级文化的过程里,突然添入无产阶级文化的热血,那时徘徊中途的小资产阶级,心慌意乱激而退走,‘遁入古俄浑朴之乡’,这一派的代表便是托尔斯泰和朵斯陀也夫斯基”。

由于文坛思想的主导风向发生了改变,此时关于陀氏的评介思潮失去了前期那种热闹场面、开始趋向平静,可以见到的文章只有这么几篇:K的《介绍俄国小说家铎司托夫司基》(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3月6日)、虚白的《陶斯屠夫斯奇的第一个知己》(《真美善》1927年创刊号)、林玉的《读了〈穷人〉》(《开明》1928年第1卷第6号)、何公超的《杜斯妥益夫斯基小说〈主妇〉译文正误》(《春潮》1928年第1卷第7期)、冯瘦菊的《俄国文学殿的双柱》(汉口大东书局1929年版《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的传略和著作思想》第4章)。不过,数量减少了,质量却有了较大的提高,出现了2篇极有深度的佳作。一篇是前面所提到的瞿秋白的《托尔斯泰和朵斯陀也夫斯基》,另一篇则是鲁迅的《〈穷人〉小引》。

在前者中,瞿秋白独具慧眼地认识到陀氏思想与创作中的主要问题是“上帝和人的个性的问题”<sup>[14]</sup>,他说:“上帝问题确与道德问题相联结,所以朵思托也夫斯基往往用深刻的文学言语描尽道德律的矛盾冲突。问题是指出来了,可是不能解决:——朵斯陀也夫斯基寻求上帝,而不能证实。个性意志自由的问题和上帝问题同等地难解决。”<sup>[14]</sup>这种理解准确地触及到陀氏作品中那极其悖谬的人性主题和作家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态度,显然这已经超越了历史和社会意义的层面,达到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显示出作者极其深刻的思想洞察力。

在后者中,鲁迅以异于常人的直觉和灵感,敏锐地抓住了陀氏作品的主要特质在于他显示了“人的灵魂的深度”,辩证地剖析了其如何在人的灵魂中展示善与恶的高超艺术,他说:“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寥寥数语,不禁令人感叹大师之间那不言自通的内在默契和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陀氏笔下的人,是相互冲突和对

立的两极尖锐地并存于一身的有限存在。他所竭力揭示的,不是其社会性,而是存在意义上的人性。人本身具有恶的因素,因此造成了痛苦,而恶与痛苦的原因就是人自身,若要消除它们,首先应该承认并正视自身的罪孽。因此鲁迅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而上了苏生的路。”鲁迅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国内陀氏研究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典范之作。

### 三、结 语

剥去历史的尘烟,不可否认,虽然 20 世纪 20 年代对陀氏的译介与研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其历史功绩毋庸置疑,它犹如一座中俄文化的桥梁,使国人走近陀氏并从不同的方面受到影响。比如在那时期,在艾青留学巴黎时“初期的读物”中就包括中文版的《穷人》(《艾青论创作》),正处于学生时代的王西彦也把陀氏作品看成自己“文学读物的范本”和“生活的教科书”(《书和生活》),蒋光慈自认“受了点朵斯托也夫斯基的技术的影响,老是偏向于心理方面的描写”(《蒋光慈文集》),冯至一度“只把自己关在房中,空对着‘死室回忆’作者的像片发闷”(《冯至诗选》),郁达夫极力追求其小说中那如“严冬的风雪,盛夏的狂雷”(《郁达夫论集》)的力度,徐志摩暗自效仿“道斯妥奄夫斯基的深澈与悍健”(《晨报》)的笔力,朱湘甚至认为多读“道斯陀耶甫司奇的小说,成熟的新文学才有作得出来的希望”(《朱湘散文》)……从中不难感受到时

人赋予陀氏那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在当时的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集外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0.
- [2] 茅盾. 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J]. 时事新报, 1920(1).
- [3] 孙福熙. 托尔斯泰同时的文学家[J]. 晨报,1921(4).
- [4] 王统照. 王统照文集:第6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 [5] 郭沫若. 创造社资料[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6] 胡先骕. 胡先骕文存[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5.
- [7] 耿济之. 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J]. 小说月报,1921(12).
- [8] 胡愈之.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一生[J]. 东方杂志,1921(18).
- [9] 郑振铎.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J]. 时事新报, 1921(19).
- [10] 周作人.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J]. 晨报,1921(21).
- [11] 茅盾.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思想[J]. 小说月报,1922(13).
- [12] C P. 朵思退益夫斯基与其作品[J]. 时事新报,1922(22).
- [13] 郑振铎. 俄国文学史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 [14]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Overview of Dostoevsky and China 1920s

DING Shi-xin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way to analyze the general history and modern communication are used.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Dostoevsky on translation and study in 1920s are collected and collate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way and route from the communication to the reception on Dostoevsky in 1920s have been combed. The popular state of re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has been explained, and the reason why the writer's identity was accepted has also be demonstrated.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ostoevsky; Russian Literature; China